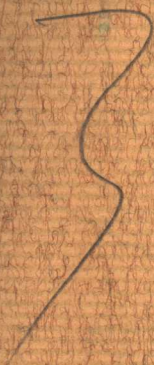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论坛



黄 平 主 编

乡土中国与 文化自觉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G12/32

2007



乡土中国与 文化自觉

黄 平 主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 黄平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8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978 - 7 - 108 - 02760 - 3

I. 乡… II. 黄… III. 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622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306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

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近一百年前，年轻的鲁迅这样写道：“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一百多年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and 实践中反复回旋的不正是这一持久的关怀吗？事实上，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论坛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理事会将根据具体主题确定负责该年度论坛组织工作的主席人选，并协助他做好论坛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届论坛的主题由理事会和顾问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论坛将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知识界的同道，展开深入的、跨学科的讨论，力求突出思想文化的内涵，提出前瞻性的问题，并在每届年度论坛结束后编辑出版相关主题的论文集和其他出版物。

2006年6月

序 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贡献及挑战

杜维明〔1〕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开门见山先把费老对我的影响和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挑战，提出来当作一个问题，让我们考虑。

费老晚年提出了四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观念如果从儒家的哲学来看是最高理想。“各美其美”就是每一种文化或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对其自身最杰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的充分肯定。美就是“充实之谓美”，从孟子所谓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是从充实的角度了解，然后对他的“君子成人之美”也能够接受。在这种交相辉映的情况下，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天下大同的理念。

可是我今天想谈的是，费老的整个思想对于一个从事儒学研究者的挑战。不是说他证明了或者他所从事的人类社会学把儒家最精华的观点提了出来——这当然是毫无争议的——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挑战。挑战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所提到的“同心圆”的观念，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都在讨论的，我想大家这次论

〔1〕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中国文化论坛顾问。

文中也提到了，就是“差序格局”。

从这个“同心圆”的角度，他有个比喻，就是丢一块石头到湖里，让它的波纹逐渐逐渐向外扩散。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考虑不仅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从双方向考虑比较全面。但这是一个对儒家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个人或自我非常强，逐渐到了外面就弱了。

另外这个“差序格局”的观点，基本是在人际关系中来体现你的价值，过分注重人际关系，也会导致困境。比如说，只有在“私”的领域里面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而很难发展“公”的领域。如果要对费老提出的这两个观念作出回应，我想需要先交代一些基本的假设，需要有初步的观点。

首先要将儒学的传统当作一个历史长河中还正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结构。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还在继续完成的正在发展的研究方向，而不是说已经定型。各位已经谈到一个关于理的问题，关于家庭在社会上起的作用的问题，关于公和私的问题，关于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关于社会实践和个人修养，外在的法律制度建构等；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各种类型的问题都可以在不同格局中提出来。另外，我们应该把这个传统当作一个跨文化的传统，除了中国的经验以外，还有日本的经验，韩国的经验，越南的经验，海外华人的经验，都不尽相同。

在中国文化区所体现的特殊形象，在其他的文化区里的表现不仅不同，而且可能大异其趣。它的正面的意义、负面的意义都可以从这方面看，毫无疑问儒家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我的注意力多半在哲学与历史学，那么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从各种不同的其他新兴科学来了解这个传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面相。费老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基本上是从人类学——而且是非常具体的田野调查上进行研究，他是在那个非常具体的基础上面，建构比较全面的理论架构，这是一个特殊的思路。

另外我觉得，看儒学有三个层次必须要同时考虑，一个属于“道”，它的基本理论或基本价值；一个是“学”，它的学术传统，在

社会上所表现的各个不同的面相；另外一个就是“政”，即所谓“经世济民”，或“经世济用”也就是说它在社会上所起的具体作用。这三个方面都应该同时考虑。一般在学术界特别突出它的核心价值，突出它的理论，而对它的学术传统，对它在社会上所体现的实际作用不太注意。正好相反，目前有一些强调它的政治儒学，对它在社会上实际作用做了很重要的研究，但对它的基础理论，对它的学术传统并不太照顾。这三个中间有很多的重叠或互补，可是大家常常把它分开来看，只能片面理解它博大精深之处。

现在我想，因为费老提出的观念，一方面对儒学在中国社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做了非常全面的分析，而且不仅是历史的分析，现实的考虑，也有对未来的前景所做的一些评估。另外，如果从哲学思想来看，他是对儒学做了一个非常全面、非常严厉的解构。我就想从这个角度做点初步的回应，并希望在讨论过程中，我有机会再做一些回应。

第一个就是对于“自我”的理解问题。“自我”英文里面有“self”，有“ego”，中文里面也是非常复杂的。到底儒家的“自我”应该怎样理解，它有没有独特的独体性，是不是一定要放在关系网络中间来理解它？我想即使我们一定要在关系网络中来理解它，也应该说它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它有两个侧面，但绝对不能够把两个侧面分割开来。一个就是它作中心点，即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尊严性，还有孟子所谓的“自得之趣”，必须在它作为中心点的这个主体性，也就是不能够为任何其他的外在力量所消解的特殊性来掌握。譬如屈原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或者孟子所讲的“自觉”的“觉”，基本上是它的主体性，这个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为己之学”。但是一个人如果只从关系网络中心来发展，亦所谓只是个孤单的个体，这种思路亦就是个人和社会绝然分割的思路，我认为和儒家的观点大不相同——像孤岛一样而不是河流。那么这个中心点的自我怎么去理解？费老的理解多半可以说是把中心点逐渐为关系网络所掩盖。真正的中心点从严格哲学意义上很难建立。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社群的问题。人类学对它的理解非常明确，这个社群特别突出家庭。但是社会学的理解也不一定如此，政治学的理解也不一定如此。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起的作用，从明代的“大礼之争”可以窥得几分消息，礼所代表的即是一位韩国学者咸在风所谓的宪法主义，从礼和欧美的习惯法的关系来探索，礼所显示的社群从家庭到族群、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而且还要扩展到人类的世界之外。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宋明儒学，像张载，一方面讨论宗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谈到“天人合一”的问题，谈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程颢的宇宙情怀。所以到底儒家所理解的在中国社会发展出来的社群，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两个向度中间有对话的关系，有辩证的关系，也有矛盾冲突的关系，必须同时解决。哪两个向度？一个是根源性的向度，一个是公共性的向度，这中间的配合就是公与私的问题。

费老的研究基本上是对私的问题做了非常全面的理解，把它摆在一个关系网络中间来理解。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关私的、正面的、负面的情况都有讨论，人类学家掌握得非常完全，但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并不能从这方面来掌握。为什么？一个“个人”，应有他的主体性，如果我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哲学家就会说你们只有具体性，没有普遍性。因为仁爱的“仁”是一种差等的爱，不像基督教的博爱或墨子的兼爱，但我认为这是对儒家非常大的误解。

我以儒家所谓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作为我思考的起点，但绝对不能只停在起点上。个人的发展，不是从个人马上变成社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族群，必须逐渐拓展。首先我们要超越个人的一己之私，但要成全我个人的修身哲学；家庭里面我们要体会温暖，体会亲情，但必须要超越家族主义，不超越家族主义根本不是儒家。

如果讲得更具体一点，有的人把儒家伦理与家族伦理混为一谈，

比如把儒家误解为意大利黑手党的那种伦理，对家里的人是亲爱的，对外面的人则非常残忍，所以要把同情推到社群，只到家族是绝对不够的，一定要在更宽广的社会，就是说不仅在社会，而且要在国家。所以明代的学者可以把公、私、官三个观念分开来，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在日本官就是公；中国可以分开来，大家常常喜欢引用东林学者的话，认为朝廷就是私，没有代表公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这批学者的公信度，绝对比朝廷的官的公信度大，所以我得批判你，即使你的官位很高，权力很大，但你并不能代表人民的公益。如果你变成私利集团，那你就不仅是私利集团。

更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比较宗教学里面我们谈到，儒家当然是以人为本，但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才有王阳明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人文精神和自然，和动物、植物、矿物都有一些关系，这个辩证关系或对话关系怎样协调是人生哲学中如何具体实践的大问题，在人类学上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也就是说，怎么样真正在自己的身体、在地球、在我们实际的社会扎根，同时又不限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社会？你一方面要完成自我，另一方面要超越自我，你在家庭要超越家庭，在社会要超越社会，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所以有的时候用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公”和“私”。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族群是公；族群是私，社会是公；社会是私，国家是公；国家是私，国际社会是公；国际社会是私，人类群体是公；人类是私，动物世界是公；动物世界也是私，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叫公。

只有从这个方面才能了解张载，否则会感到为什么这个人的头脑那么“糊涂”，一方面讲宗族，一方面讲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的实践，他的思想结构，他对问题的理解，造成了很多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最基本的矛盾呢，还是他在实践中证成了他思想上面非常严格意义下的统一性即所谓“和”呢？这个“和”的观念，它的相对面就是“同”，同是和的最大相对面。“和”必须要有“异”，没有“异”就没有“和”。

所以晏婴就有很好的譬喻：你要烧一锅很好的汤，要有各种不同的作料，引申而言，你要做一个很好的画家，要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你要听很好的音乐，要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因为不同才能“和”，才能超越“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一套实践的理念，是建构在非常严格的理论的理解上，而且理论是通过它的实践来证实，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

费老对儒家最大的贡献，从中国文化的自觉来说，就是把它的特殊性——我记得他和马林诺夫斯基交谈，后者说，你太突出你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把它转化为普世性。他就是认为这个特殊性太重要了，要特别强调。特殊性当然包括——如果用我们刚才讲的话讲，就是一个活生生具体的人，他所有存在的条件所要掌握的就是其具体性。中华民族在某个发展的阶段，在特殊的时空间，像江村，或者更小的团体，当然有它的具体性，费老就是说要突出这个具体性。

另外，怎么回应马林诺夫斯基说的，这个具体性怎么会为普世价值？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就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个地方知识为什么有全球意义呢？因为它是深化的、全面的，有微妙的思考集中在这里。我们人类学者当然要耕耘这个非常具体的地方知识，但视野和方法必须有普世的内涵与价值。

我最后说一点，像基尔兹（Clifford Geertz），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创意的文化人类学家有这么一段话：“正因为你面对绝然的他者，你的心灵才能全面解放。”你如果没有碰到跟你完全不同的他者，你真正的自我解放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年以前，我那时还在伯克利大学教书，基尔兹在柏林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评讲我的论文，当时他提到了我碰到的三个困境。他说，第一个，你从事的是传统研究，但你面对的是现代意义，也就是传统研究的现代意义；第二个，你是专业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但是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从事专业的人，你怎么跨越你自己专业的边界；最后更有趣的是，虽然你现在在国外，你怎样把

中国文化的特殊问题和现代世界各大文明所创造的普遍问题结合起来。针对这三大挑战，他后来写成文章曾在《东西哲学学报》上发表。我当时也做了一个回应，现在想来我的回应是很肤浅，但他的问题一直对我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像费老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我的回应是即兴的，也是片面的。我觉得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所以就用这个话做开场白。谢谢。

导言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1]

舒建军 贺雪峰 黄平^[2]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作为一个问题，也就一百多年时间。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写它要颇费思量，连写什么字，说什么话都成问题。而再过些日子，我们只能在社会变迁的激流中做这篇文章。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

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看到历代先贤为之孜孜矻矻的身影。从最近的说起，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费老当

[1] 本文初稿由贺雪峰起草，舒建军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黄平负责最后定稿，“中国文化论坛”的各位理事的多次讨论也对本文有极大的启发，特此感谢。

[2] 舒建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初在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江村和中国之间的关联会促及西方人类学范式的转换，这样的题目是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加上去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远非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所可比拟。对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进行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奋，但对当时的中国学子来说，如何促进民生和抵抗外侮是迫在眉睫的行动。所以在《乡土中国》之前的作品，如《江村经济》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西南社会经济调查），就是对当时中国如何朝向现代文明的进程的描述与阐释。然而，很快，到了 1947 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就是这个还仍然只在纸上的模型平息了之前费老对传统中国经济社会不能如其所愿地快点进入现代的冲动。同样在 1947 年，费先生远赴他乡对昔日的老师和同学谈起了“乡土重建”。这一次，西方人听得很认真。因为费先生在这次讲演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西方人刚刚经过了世界大战，带有一丝“西方的没落”的表情。费老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过于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资源利用上的克己，这种特性虽然让自己大吃苦头，但终究没有贻害别人，而西方病就病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两分推至极端并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费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费孝通文集》卷四，312 页）。这仅仅只是对西方人讲的。因为费返身回国后并没有证明自己这个历经东西方文化反思而提炼出的乡土重建理念恰切与否的机会。

在费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他并非独此一家。这其实是 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合唱。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都有所认识。位育这个词就来源于潘光旦。至于开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更是如此。但当时首要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现代经济力量的建设。30 年代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有的只是尽快的行动。毛泽东在他此前的经济社会调查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新的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先生重新出山时，他的主要精力却仍然是他 30 年代未完成的“江村经济”，因为毛泽东只有时间解决一个“江村政治”问题，即乡民经济之上的政治强制关系的解除。这种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序现象提醒我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每日必修之功，而将这种反思带到人们的实践中更是任重道远。20 世纪 90 年代，费孝通先生看到乡镇之中现代工商业兴起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慰自己一下，多年的从实求知路终于有了结果。但 1947 年那个乡土中国的宁静、东西方文化特性反思之上的乡土重建理念同束缚中国的乡土的尽快破除之间的观念转换，使费孝通先生更有勇气面对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昨日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之间的变化。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对半个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勾连使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照和这种视角的更为广阔的画卷。在展开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之前，请允许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放回到 20 世纪的历史之中。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

20 世纪 30—40 年代知识分子回转身来看中国的姿态比“五四”时期要温和得多，这与中国的参照物——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师法的状态有关。19 世纪中后期中国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自强运动在中西体用

之间一直持续下来的紧张状态到 40 年代缓和了不少。30 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尽管从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没有最后的赢家，但它所透露出来的多样现代性的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乡土重建的实践上，立足于本土的现代发展模式占有主导优势。这种多样性的状态在 40 年代的中断反衬出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发展模式立足于本土的成分反而要多于立足于实地的成分。毛泽东 30 年代就确立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改造实践反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至于 80 年代以后这种多样性的状态难以立即恢复。表面的原因是本本主义妨碍了对毛泽东早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必要反思与重新发现，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使西方人也失去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必要反思，远没有“二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己文化进行系统反思的迫切性。西方文化在文明发生学上相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成长期的普遍性的种种西方中心论层出不穷。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文化断层期和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一种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世界格局的真空发展阶段。西式现代化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成长奇迹，也催生了对儒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一种肯定的心态，但这种以西方为圭臬的普适现代性的追求仍然不足以成为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多重现代性的文化基础。

“二战”以后，来自于更多地区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 20 世纪末汇成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潮流，这些另类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已经成为多重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至少在发展道路或者方向上是西方现代性的有力的知识替代。这些多重现代性的开掘涉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时期被遮蔽掉的本土知识和发展经验，也涉及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和解构。多重现代性内容的建构和西方现代性具体内容的解构为当前我们对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全球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原则改造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现象提供了分析与批判的知识基础。例如，中国等其他文明世界对本土历史的重新发现，中国突破 1949 年、1978 年，1919 年或者 1860 年等等过去断裂节点的大

历史的阐释，非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比西方现代性进程更为丰富的发展模式的发现以及西方生态与炮舰殖民政策与传统政治经济力量同市场相结合模式的延续等等。这些知识均有助于我们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和多重现代性建立的可能。这些知识为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自觉在中国的兴起做了很重要的铺垫。另外，作为一个社会工程来解决的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在各种机械式的努力都在理论上呈现出无力甚至无理。出于对一向秉持的观念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具历史深度和全局理解的要求，费老等中国知识界深思熟虑之士也在真切呼唤着文化自觉。对于今日中国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读书人少有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视野，社会问题被作为社会工程来一个个地解决，经历文化断层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专家只能用各自习得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辞藻来套裁中国现实，鲜有创造性地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回到中国社会问题本身分析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自觉。因此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功能超强的解释体系还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深刻而具整体性的叙事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对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形象的整体叙述了。因此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专家意见往往还不如直接接触实际事务的大众来得全面和具体。因此，同政策制定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都做成了快餐，既没有相关的历史性，也没有世界格局的关照，而只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中摇摆。大局和全局的定力缺失导致民风浮躁，无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一知识挑战。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回到文化自觉的视野中，将已有点滴文化自觉视野下积累起来的知识整合起来做全面的观照，才有从容解决的可能。

全球化的冲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

文化自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习得的内在修养。也就是一日三省